

琴子:以微笑回报世界

文/李悦 王新民

30多年前,当我们认识琴子老师的时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微笑,那是明朗、真诚的微笑。当她90岁高龄的时候再见到她,她的微笑依然是那样的明朗和真诚。

琴子老师1929年出生在松花江畔一个贫寒的家庭,为了让她读书,父母靠借来的100块豆饼,加上当掉家中唯一的过冬棉被,把她送进了当地的小学。因为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琴子从小就懂得发奋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17岁,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她和超克图纳仁结为夫妻,共同走过了漫长的人生。最初他们投入文学创作的时候,选用的表达形式并不一样,超克图纳仁选择的是戏剧,而琴子则是以散文和小说为主,以帮着丈夫创作剧本为辅。当超克图纳仁因《金鹰》誉满全国的时候,琴子则在内蒙古文学刊物《草原》当编辑,那是个“为别人做嫁衣”的职业,但她甘为人梯,不仅担任专业作家的编辑,更多的时候还要扶持业余作者,默默地不辞辛苦为他们改稿。

当时,《草原》编辑部只有五六个人,琴子除了编辑改稿还要负责排版、插图、印刷、发行、发稿费。尽管工作量很大,琴子还是挤出业余时间写了一部报告文学,记述了毕力格巴图同志做地下工作时的英勇事迹。作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后,接连在《北京晚报》和《党的教育》杂志连载,上海出版社还出版了单行本。这给了琴子很大的鼓励。从此,她开始投入了电影戏剧的创作。

当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布赫同志十分重视自治区影视事业的发展。于是,琴子决定与丈夫超克图纳仁一道,依据《蒙古秘史》这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的作品,创作国内第一部讲述成吉思汗故事的电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阅读史料,搜集素材,数易其稿,最终创作完成上下集电影剧本《成吉思汗》。乌兰夫同志在看过剧本后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更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在听取



了各方意见后,他们又进行了认真修改,直到投入拍摄。

1986年电影上映了,引起了很大轰动。琴子至今记得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骑着马赶到露天放映点,去看电影的情景,当近3个小时的《成吉思汗》散场后已经是深夜了。回家的路上,牧民们唱着影片中的主题歌纵马驰骋,雄浑的歌声响彻草原。不久,影片在蒙古国等国家上映。为看《成吉思汗》,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几乎万人空巷。琴子说:“当时乌兰巴托的电影院根本买不上票,主办方不得不在广场加映,有开汽车来看的,有骑着马来看的。可是没有拴马桩呀,牧民们就把马拴在电线杆上,一根电线杆上拴十几匹马。到处是汽车和马匹,那景象十分壮观。到了散场再看,街道上到处都是马粪蛋儿呀!”

虽然《成吉思汗》获得了当年内蒙古“索龙嘎”一等奖,但琴子和超克图纳仁认为3个多小时的电影不可能全面反映成吉思汗的一生,只能写到他统一蒙古各部。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他们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天骄轶事》,小说完成后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面对奖状,琴子露出她那惯有的微笑,她说:“得奖只能说明过去,明天仍然等待着我们。”

进入九十年代,这对志同道合的剧作家夫妻先后退休了,于是他们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他们最喜欢的两件事情当中,这两件事就是读书和写作。他们有5个孩

子,全家七口人依靠两个人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只要能省下些钱,就用来买书,这成了家庭主要的生活支出。他们按照国内外的文学史买书,凡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就都买回来,有时新书卖光了,他们就到旧书店去寻找。只要到北京开会,他们必定到王府井的旧书摊。家里收藏的高尔基和契诃夫的不多作品都是在旧书摊上买到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晚饭后,全家常常在一起读书中的章节,聊书中的故事。有时还把家中藏书的书名编成谜语,玩猜谜游戏,谁猜中了,还要得到奖品。家里还订了《少年报》和《小朋友》等刊物,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个重视教育和注重文化传承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大儿子捷尔戈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连续导演拍摄了由琴子夫妇创作的电视剧《聚宝姑娘》和《翰海风云路》,因其题材新颖、内容生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受到观众的好评。接着他受聘正东影视公司,担任李连杰拍摄的《方世玉》《精武英雄》《太极张三丰》等多部有重要影响的电影作品的制片人。

正当捷尔戈逐渐成长为影视界颇有名气的制片人,琴子老两口也因后继有人深感欣慰之时,灾难突然降临了,一次交通事故夺去了捷尔戈的生命,那年他才41岁。

人生无常,突如其来的灾难给古稀之年的白发人带来巨大的打击。琴子和老伴儿在半个世纪的相伴中,遇到过许多苦难,他们都挺了过来,而这一次失去儿子

的她却真有些挺不住了。悲伤的眼泪不住地流淌,流淌……恍惚间,失去儿子的母亲琴子脑中闪现出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于是,琴子唱起40年前哄儿子入睡的歌谣。唱着唱着,她痛苦的脸上渐渐露出了惯有的微笑,面对世界的痛吻,她报之以歌和微笑。

文学圈中的朋友前去安慰琴子老两口,诗人阿古拉泰特意写了散文《鹰的翅膀》,希望这一对老金鹰振作羽翅再飞翔起来。远方出版社也主动赶来,加快了6卷本的《超克图纳仁文集》的印制。

琴子又牵起超克图纳仁的手,微笑着前行,又是读书、写作,又是足迹相印,又走过20多年。

2018年,超克图纳仁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琴子。在他的追悼会上,琴子坐轮椅而来,她的脚印再也不能与他的脚印相交了。我们望着超克图纳仁安详的遗容,想起他在几年前的一次聚会上讲过的一段话:“超克图纳仁与琴子,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走到壮心不减的暮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这份真情感动了时光,也温暖了岁月。我们自愿地选中了这条创作道路,我们手拉手、肩并着肩走过来,她的脚下有我的脚印,我的脚下有她的脚印,我们共同吃苦,共同接受历练,一直走到今天,我们没有图名,也没有图利,只求观众的掌声和读者的笑脸,今天我看到了读者的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观众的掌声很热烈,所以我很满意。谢谢!”

超克图纳仁离开琴子已经快两年了,琴子从不感到孤独和寂寞,她的心,一直沉浸在回忆当中,与爱人相处的往事如同电影一幕幕闪过……有时她想着想着,对着超克图纳仁的照片,琴子再次露出了微笑,面对着世界给予的苦难和幸福,都要回报以微笑,她知道他懂得。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文学速读

前行路上的希望之旗

文/马亚伟

记得小时候,麦收时节我要跟父母下地割麦。天还没亮,父母和我已经站在田边挥着镰刀跃跃欲试。我看了看长长的地头,觉得要开始一场漫长的苦旅,忍不住叹了口气说:“爸,这么多麦子,咱们啥时候才能割完呢!”

麦畦真的是太长了,一眼望不到边,金黄色的麦田一直绵延到邻村。我简直有些绝望了,觉得这辈子都割不完这么多麦子。我们开始割麦,镰刀飞快地舞动着,发出“刷刷”的声响,麦子应声倒地。可是,我们像蠕动的蚕一样,慢慢地行进着,丝毫看不到希望。有时候,漫长是一件让人恐惧和绝望的事。即使父亲割得那么快,太阳升起的时候也只是割了一个地头。我彻底不想干了,放下镰刀坐在地上,赖着不肯再动。

父亲见我这样,从小拉车上拿下一面自制的小红旗。这面小红旗是干农活时用来做标记的,插到地上很鲜明。父亲往前走了一小段,把小红旗插上,对我说:“割吧,割到小红旗那里咱就歇会儿,把早饭吃了。”那时候麦收时节大家都抢时间,一般人都早早去割麦,把早饭带到地里吃。

我看了看小红旗的位置,还好不算远,割到那里就能吃饭歇息了。心里这样想着,立即觉得有了力量。我跟在父母的身后,卖力地割了起来,并没有感觉到有多累。一会儿的工夫,我们就割到了小红旗那里。那面小旗子真像一面胜利的旗帜一样,让人欢欣鼓舞。我欢呼起来:“吃饭喽!”

我们吃过饭,稍作歇息。父亲又把小红旗插到前面不远的位置,对我说:“瞧见没有,今天上午咱割到这里就歇了回家,下午凉快了再来割。”小红旗插在不远处,依旧像一面胜利的旗帜一样招摇着。对我来说,小红旗就是一种希望,只要与它相遇,就意味着完成任务,可以休息一下了。很快,上午的任务又完成了。

下午的时候,父亲如法炮制,用小红旗做标记,让我们奔着目标一点点前进。父亲不停地对我说:“胜利在望了,都看到地头了,加把劲!”胜利在望,真是鼓舞人心的词,让我觉得目标不是那么遥远,胜利就在眼前,也不觉得累了。到了天擦黑的时候,大片的麦子都被我们割倒了。我们就这样,在父亲这面小红旗的鼓励下,顺利完成了任务。

父亲的做法让我领悟到,再漫长的征程,只要前行的路上有希望的旗帜,心中就不会恐惧绝望,慢慢走下去,一定能抵达胜利的彼岸。我毕业以后,分配到一家单位,可是我的专业不对口,需要重新学习新的专业知识。我拿着十几本专业书籍,心里很犯怵。忽然,我想起父亲插小红旗的做法。于是,我把十几本专业书籍依次排好顺序,按照三本一组分成几组。我对自己说:别怕,一组一组地学,一组一组地过,过完一组就是一次小小的胜利,要好好庆贺一回,给自己一些奖赏!

这样开始此次的征程,我同样没感到有多累,反而觉得很有趣,很有成就感。不到一年时间,我就轻松地学完了这些专业,别人都说我创造了奇迹。

生活漫长,人生坎坷,只要你在前行的路上插上希望的旗子,就会带给自己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